

皇帝與西藏重要政教領袖之一的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貝丹益希於承德會面，並在萬樹園設宴款待之。另外在本書中未着重探討的部份，還包括了1793年乾隆皇帝在這裡接待了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喬治勳爵馬戛爾尼（George Lord Viscount Macartney）。這些清朝歷史上的重要事件都與承德息息相關。我們必須承認，外國政要也許對承德比北京更為熟悉。承德不僅是當時內陸亞洲的首都，更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

清朝皇帝從北京巡狩至承德，建文廟以修文，行圍獵以講武。在藏傳佛教領袖的賜福、蒙古王公的臣服與儒士漢官的協助下，清朝皇帝得以成功統治廣大的滿洲帝國（Manchu empire）。透過這本書所提供的承德邊緣視角，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清朝皇帝維持帝國一統中的作用：名為避暑，實為柔遠；圍獵為名，講武是實；宴請來使是象徵，宣示主從關係為意義；崇尚佛教是手段，籠絡蒙藏為目的。承德不僅是清朝大一統帝國的象徵縮影；反過來，它也在清朝維持大一統的過程中起了實際作用。從承德這個制高點往下俯瞰，當可使我們更清楚清朝在維持多民族帝國統一上的細膩之處。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清朝的大一統並非文化的大一統，而僅是政治上的大一統。事實上，承德景觀之混合文化特色與清朝基於族群主權所實施的各種民族隔離與地域封禁政策之間，存在着極大的落差。（有關清朝的民族隔離與地域封禁政策，參見馬汝珩、馬大正編，《清代的邊疆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但似乎少有相關研究討論此一落差的意義。針對治下的不同民族，清朝皇帝「因其教，不易其俗」，尊重其文化與信仰，但同時也實行各民族之間的隔離政策，而自己則以唯一得以跨越不同民族文化藩籬的統治者自居。這也是作為征服王朝的清朝與典型中國王朝在帝國建構上的差異之一。

蔡偉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周大鳴，《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的追蹤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349頁。

我最早接觸葛學溥（K. U. Kulp）的《華南的鄉村生活——家族主義的社會學》一書，還是在中大攻讀文化人類學碩士研究生的時候，之後我利用他書中提出的有關家族的四種類型的學說以及之後的漢族家族研究的狀況，

特別是弗里德曼有關東南中國社會的研究，並結合有關調查，討論了有關漢族社會人類學的家族研究的理論和實踐，之後在北京大學和東京大學讀書期間，我對漢族社會家族研究的興趣，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並出版了《家與中國社會結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一書。直到今天我對家族主義與中國社會的關係還在繼續思考和研究，而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繼承性問題，更是我的興趣所在。然而，對於漢族社會的繼承性的問題，如何從人類學的學術視角進行把握呢？在我看來，對於早期有關中國社會研究的田野調查報告和著作中所描繪的當時的社區面貌的再調查或稱之為的追蹤調查，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學兄周大鳴教授新近出版的《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的追蹤研究》，就是在葛學溥當年研究的基礎上，所進行的追蹤調查，並把其調查與中國社會變遷的大環境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然而，這一國際學術界非常著名的村落——鳳凰村，其確切位置究竟在哪裡？其二葛學溥本人是否真的到過此村？這是漢族社會人類學的疑團之一。恩師末成道男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人類學題解》中，對於上述問題也沒有具體的答案，並對葛學溥是否作過田野調查，提出了質疑。進行鳳凰村的追蹤調查，與其他追蹤調查的村落，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不確切性。要在複雜的潮州地區，找出這一調查點，的確是件困難的事情。周著就是以此為突破口，以解開學術疑案為起點，逐漸把我們帶入到葛學溥所研究的村落社會之中。作者給我們展示了一幅鮮活的村落社會的變遷場景。鳳凰還是原來的鳳凰，但其相貌早已發生了葛學溥所想象不到的變化。

地點找到了，但是從何種角度來進行再調查呢？追蹤調查，特別是對於學界大師所進行過的田野進行再調查和再研究，有很多的難點。其一，彼時的研究到今天，時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問題意識與研究事項和今天相比，很可能大相逕庭；其二，彼時的研究（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調查和研究）關注村落整體，而較為忽視個體以及在解釋層面的思考；其三，1949年前後，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過革命的洗禮，社會階層和人們的精神世界都與以前完全不一，如何來敘述這種變化？這在學術思考上很難把握；其四，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全國各地原有的傳統其實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新傳統，如何又成為村落變遷的內發的機制呢？這一新傳統和1949年前的傳統有何不同呢？其五，即使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由於受政治的影響，社會發生了很大的動蕩，如何來表述這種動蕩呢？當然，類似的問題還很多，但有一點共識是，改革開放之後的農村，確實是發生質的變化的一個場域。而對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農村而言，村落變遷的研

究，更加富有時代的氣息。面對如此多的問題，作為一個研究者，如何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呢？本書作者非常鮮明地抓住了葛學溥討論的「家族主義」這個核心概念，以此為起點，以婚姻、家庭、宗族等社會人類學中的親屬制度的研究為主綫，突出社會結構在村落社會中的內在本質性特點，以其他的經濟、政治、文化事項為輔綫，勾畫出具有濃厚的潮州文化傳統的村落社會變遷的軌跡，從中讓我們全方位地窺視出華南農民社會的變化。

中國社會人類學中的親屬關係，主要通過家的文化觀念和其社會性的結構和功能體現出來。「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認識中國社會的關鍵詞。費孝通先生談到「中國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間。一個人不覺得自己多麼重要，要緊的是光宗耀祖，是傳宗接代，養育出色的孩子。……看來繼承性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世界上還沒有像中國文化繼承性這麼強的。繼承性背後有個東西也許就是kinship，親親而仁民。」（費孝通，《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14卷，頁387-388。）從中看出，費先生同樣強調文化的繼承性問題；而能延續此種繼承性的要素——kinship（親屬制度）是非常關鍵的。翻開海外有關漢族社會人類學的研究著作，很多學者都在強調社會的延續性。如Judith Stacey的研究認為，大部份留存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家族價值觀念和習俗，並非與時代潮流不合，而是通過一系列重新而且充份的結構上的支持而保留了下來。（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在廣東做過田野調查後，波特夫婦得出的結論也是強調社會的延續，「建國後的36年裡，從1949年到1985年，雖然在曾埠有很多表面上的流動和變化，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顯著的延續性。」（Sulamith Heins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25.）當然，孔邁隆、蕭鳳霞等的研究，也有類似的思考。

如果我們把書中的章節作進一步分析的話，我們會非常清晰地看出，作者對於社會結構研究的重視，在某種意義上強調了英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傳統。本書除導論外，共分為十四章。社會結構有關的章節為第三章的第二節，關注鳳凰村的家庭經濟，從家庭的職業與經營進行了分析；第四章為鳳凰村的人口，在對鳳凰村近百年來人口發展分析的基礎上，對於該村人口的結構特徵和變動，特別是華僑與人口流動、婚姻與人口變動的關係，做了非常翔實的統計和分析；第五章為鳳凰村的婚姻，對於1949年前後該村的婚姻變化，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定量的研究，給我們勾畫出了本村的婚姻

圖象；第六章是關於鳳凰村的家庭，並對家庭的類型和影響家庭運行機制的動態的「分家」進行了討論；第七章，是對於鳳凰村的宗族制度的分析，特別是對於祖先崇拜和宗族之間的有機聯繫包括改革以來宗族的復興和創造，結合葛學溥的調查，做了梳理；第八章是關於鳳凰村的「輪火頭」與老人贍養之間的關係，對於「輪火頭」制度在現階段中國社會中的合理性作了分析。這五章加一節都是以婚姻、家庭、宗族等為主綫展開的。而第九章的鳳凰村的信仰與習俗、第十二章的鳳凰村與周圍村落的關係和鳳凰村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的社會結構與儀式、信仰以及村落組織之間的有機聯繫。第三章的鳳凰村的經濟生活、與第十章的鳳凰村的文化教育和第十三章的鳳凰村未來變遷的方向，主要從經濟和文化教育的視角，給我們展示出鳳凰村的過去的經濟生活和未來的變遷方向。最後，作者對於鳳凰村的變遷的原因，從變遷的外部因素、村落社區的內在因素以及傳統的復興與現代化的角度，做了有關這一村落過去和現在的變遷軌跡的學術探索。

作者在對葛學溥的學術評價中，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如葛學溥的家族主義的概念、家族的分類、鄰里與「社區」的概念等等，這些概念並非完全出自西方學術系譜中，而是研究中國社會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從中看到，即使在最早的漢族社會的研究中，葛學溥已經注意到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問題，即在中國研究中如何把民俗概念上升為分析概念，同時也是我們中國人類學面臨的問題，其實葛學溥早已經做出了榜樣。而周大鳴的研究，正是在這一榜樣的感召下，讓我們認識了八十餘年來華南農村和農民的變化軌跡。

麻國慶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唐力行等著，《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367頁。

《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是近年來區域史比較研究的一部力作。

唐力行長期致力於區域社會、經濟與文化史研究，率先將包括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引入區域史研究，在區域社會史研究領域享有盛譽。20世紀80—90年代，他先是進行徽州的區域研究，並從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等基礎